

# 独立阅读

2007 年 10 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

**特别致谢：**李伟为（上海）

## 编者按：

贪玩之心，人皆有之，由于假期的缘故，这一期“独立阅读”耽搁了几天。有一些朋友发来信件，询问为何“失约”，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贪玩的错误，决定悔过自新，赶在假期即将结束之际送上这份微薄的假日礼物。

本期介绍的书，有不少与民国有关，也有一个专题围绕转型而设。近日央视正在黄金时间播放《复兴之路》，讲述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据说与《大国崛起》是姊妹篇。可惜从已经播放的部分来看，虽然也采访了史景迁等资深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叙述属于旧瓶装旧酒，远远不及几年前嘎然而止的《走向共和》。与影像相比，书籍或许是枯燥的。但在读书人看来，那些学术著作揭示的历史秘密，惊险曲折之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我们无意劝您远离影像，但是强烈建议诸位朋友用更多的时间亲近书籍。

## 目录

###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 专题：政治转型

---

吴强：威权政权的前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延续？

张昕：“赎买”的政治经济学

### 书评

---

严飞：英国让香港怀念？

王晓渔：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

成庆：卡萨尔斯：美是激情与道德

### 影像

---

汪伟：金狮奖的题外话

## 推荐

曹乃谦:《佛的孤独:曹乃谦中篇小说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7月,25元。

一部充满了命运感、故事感的小说。

[美]塞林格:《九故事》,李文俊、何上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17元。

对于那些受“盗版”塞林格影响的读者来说,是重温的好机会。

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28元。

他的书里明显规避了过去土地制度问题上的错误,也在农民的权利问题上进行了理性思考。

[加]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世俗化时代),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7, \$39.95。

当一个垂垂老矣的人以这样一本著作来为其思想做出确认时,我们或许应该对此认真对待。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于培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32元。

今天重读别尔嘉耶夫,非但不会为其表述的模糊暧昧而不满,反而会觉得,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真实的体验才是哲学(或宗教)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德]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19.8元。

这本书讲的似乎是一个音乐的事件,但是对于尼采而言,瓦格纳是他试图超越时代的一个迷思。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30元。

当年被启蒙所鼓舞的知识分子,如今已经秋叶凋零,看来启蒙运动也未免不会流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尴尬困局。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28元。

一位出版界元老的“朝花夕拾”,可惜是节录本。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25元、28元。

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虽然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依然和今天密切相关。

## 独立阅读报告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曹乃谦的中篇小说《佛的孤独：曹乃谦中篇小说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7月)，读者即使没有读过恐怕也略有所闻，因为在曹乃谦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部充满了命运感、故事感的小说。在他日益被报道的今天，几乎每篇人物特写都会特别提到这位山西大同的警察，他35岁那年和朋友打赌写小说，却连中篇的概念都没有，写起来没个收拾。这部小说就是《佛的孤独》，是今日曹乃谦故事的开始。在继《最后的村庄：曹乃谦短篇小说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部落一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和《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之后，曹乃谦最近推出《佛的孤独》，不过这本书早在1996年就曾被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

对于曹乃谦这位作家，可能中国的文学评论界(包括媒体评论)都较尴尬，毕竟这是马悦然欣赏的中国作家，尤其是“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赞，可能被目为跟风；弹，需要加大自身力量，起码要打叠起十二分的精神，这后者的困难系数未免太大。但我以为，读者完全可以不受此影响，因为只要你读过一本曹乃谦，就会明白他的小说，从题材、人物、叙事到语言风格，几乎和现在的中国作家格格不入(同样的，如果你注意到他的采访，也会发现这种不同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不是远远不如现在的著名作家们那么熟悉市场)，这难道还不能激起你的好奇心？再说，读完一部小说，好与坏，哪个读者心里没有一点底？死命捧，那不是“普通读者”。

我个人觉得，曹的小说，像一些跟破案有关的小小说，特别像刑事报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小说归到他对现代题材的处理上。又如，有些小说主题先行，使得小说读起来成了故事。又如，其小说主题一直在个人记忆上挖掘，时代背景一直在“文革”时期打滚，他所追求的对于过去女性的描摹，如此种种，未尝不反映出一种艺术上的单一，尽管这种单一也是风格，可是没有太多的好奇心。语言是他的最大特点，这一点是曹乃谦最成功的地方。无论读他的哪一篇小说，语言都是活生生的。这部《佛的孤独》收录了他较新的作品如《鱼翔浅底》，但大部分作品其实在早前的《部落一年》里都有。同样是跟个人记忆有关，曹乃谦写他养母故事的(片断)《换梅》，写他养母如何从一户人家那里偷他，再奔赴大同，中间遇狼一段特别好，写得饱满异常。如果说我要向别人推荐曹乃谦的话，仅此一段就够了。

如果说曹乃谦还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可能是创作体裁上。他还在写中篇、短篇，这样的作家很少了，即使在给作家、文学界看的文学杂志上，成名作家还热衷于此的似乎很少(当然，刘庆邦算一个)。著名作家一出手，哪个不都是重磅炸弹，巨牛叉的长篇，全国媒体争相报道，想不畅销都难。贾平凹的新长篇《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倒是听说了，不过却读了另外一位作家的新长篇——韩东的《英特迈往》(《花城》杂志，2007年5月)。作者在注中说，“英特迈往”乃成语，形容超越之意，我辈也只能拜托谷歌才能恍然大悟。假如你刚刚看过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碰巧又刚刚看过知名网友和菜头君的评论《红色老大哥的春梦》，那么，《英特迈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也是红色后代的故事，只是行政级别差了一些。简单的类比是危险的，因为韩东不是姜文，虽然他的故事跟“下放”、“文革”有关，但仔细比较起来，与其说有质的差别，不如说有些闪耀的亮点。在韩东的叙事里，“我”是属于配角的，他的主人翁朱红军，应该算得上一个完美的时代角色(几乎跟性没有关系)，还是出演悲剧一角，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朱红军身上就没有欲望勃勃无处发泄的力比多象征？在结尾处他已有的那点权力欲，看起来也是一桩人生的栽赃。

《英特迈往》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地方：小说的语言(大白话是不是作家对文学语言的一种反动)；上面谈到的作家“自我”的设置(至少，从《我和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以及这部小说看来，叙述者都有猥琐的特征，至于是否作家有意为之、像对待语言那样处理，就不得而知了)；结构的松散性(当然这首先要归咎于杂志未全文发表，使得一些人物的退场成了谜)；主题(是个人史的需要还是力图搞清楚时代的荒诞感，也不清楚)……“红色后代的故事”，请允许我再一

次笼统地命名一下这样的艺术作品，不论它们表现的过去是怎样的，但作者对其中涉及“现在”的表达是比较能说明作者意图的，不满？反省？宣泄？至少在韩东笔下，“我”、丁小海等人物生活在现在，既不是崇高的，也不是宏大的，甚至也没有高潮的迹象，惟一存在的是荒诞感。

【在这里有必要引一段李雾在其专栏集《吾讲斯美》里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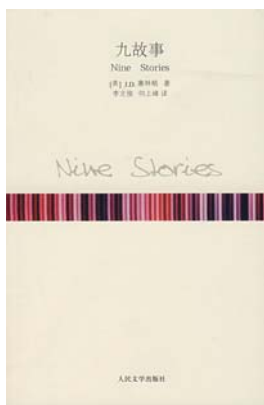
“我国作家写过很多‘文革’中极‘左’思潮和政治压力所造成的婚姻悲剧。在我国作家笔下，女的通常很漂亮。而男的，如果本身政治条件好，是看中女方漂亮；政治条件差则是不但看重女方漂亮，还看中她的工农出身。但《半生》里那个男的，为了表示自己思想好，找的竟是又丑又笨的女孩，真的是各方面都配不上他。常听国人问：我们有三年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政治大灾难，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写不出可以荣获诺贝尔文学家的皇皇巨著？如果以大世界的眼光看，问题或许可以这样问：为什么没有‘文革’经历的外国作家也能写出优秀的‘文革’题材，能把‘左’倾政治立场泛滥到个人生活的流毒写得那么透彻？”（《失去了天堂的大世界》，《吾讲斯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310页）

这不是针对以上提到的作品，而是我觉得作为文学批评，这一段说得很好，发人深省。】

尽管杂志有这种“节录”的毛病，看到《译文》上刊登了桑塔格传记节选，也赶紧读下去（《铸就偶像：桑塔格传》，姚君伟译，《译文》杂志，2007年9月），作者罗利森·帕多克夫妇是美国著名的桑塔格研究专家，除了《铸就偶像：桑塔格传》（2000）之外，还有《阅读桑塔格》（2001）、《女性偶像：从梦露到桑塔格》（2005）等。我个人阅读感受是：充满了妙趣横生的高级八卦，引人入胜。比如桑塔格到欧洲发展时期的“扮野”，与文坛引路人切斯特的友谊与齟齬。她的成名还与美国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一腔热情分不开。也许也是节选的原因，始终读得不如书那么畅快（不知道上海译文何时出版），使得无论《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还是《英特迈往》，都显得有些芜杂，像未定稿。

这个月读书仅此而已，为了充数，把翻过的书罗列一下，仅供参考：

从《世界文学》杂志选出的两本选本，《大海与撒丁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和《再见了，马拉卡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以地理散文和地理小说来选，虽说有些不那么标准，却基本上都是篇篇可读的佳作。法国人吕西安·博达尔的“领事三部曲”，买了其中一本《领事先生》（陈寒、沈珂译，许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盖因我对近代四川感兴趣，何况还是一个鬼佬写的。塞林格的《九故事》（李文俊、何上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据说这次是正版出品，对于那些受“盗版”塞林格影响的读者来说，则是重温的好机会。因为 BIBF（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读了德国作家雅各布·海因的小说《延森先生遁世记》（吴晓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4月），感觉不错，的确跟我们已往读的德国小说不一样，于是赶紧去书店买了最新的德语小说选《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樊克编，丁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8月）。



##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一位朋友看了我大部分读书评论之后，对我说：“你的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所以你以农民文人的身份自豪，为农民阶层鼓而呼”。我大吃一惊，事实上这些年我最大的努力是尽量擦掉自己身上的农民习气，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读者这么理解我，要么是我的努力成效不够，依然以一种农民的生态出现在城市里；要么是我的朋友理解有误，至少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清晰的向度：我不可能仅仅为了农民的表面财富才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只是为农民的权利说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总是站在公平结果的角度同情农民，却没有去思考农民权利的式微。久之，我们的农民情结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公平、粗糙的愤怒。我们与历史里那些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并无二致。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拥有参与到这个市场里的基本权利。所以，与其说我是在为农民说话，不如说我是在为所有权利被剥夺的中国农民说话。或者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诸多中国人，他们参与市场的权利，仍然处在一种被剥夺的历史范式之中。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正是抱着上述心态，我在 9 月读到了加拿大柯鲁克夫妇的两本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显然，柯鲁克夫妇对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赞美有加，认为“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柯鲁克夫妇还遗憾地认为：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70 年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带着某种对历史的审视来读这样的书，体会更多的似乎是某种讽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其一是当年的推翻地主富农制度，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农村既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导致 70 年以来，中国人在思考农民土地制度问题时，把当年的这种破坏行径当成了一种经济学前提。这正是到今天为止，广大农民在产权意义上被这个市场遮蔽的主要历史原因；其二，当年农民们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抢夺之后，并没有按照某种乌托邦思想的设计，真正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70 年的历史演进并没有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反之，国家以某种人格化的强权形象出现，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农民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当年地主富农悲惨的命运同样降临到了这些曾经斗志昂扬的贫雇农身上。

历史再一次以土地产权意义上的错误戏弄了中国农民，并且这一次的错误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大大小小的农民性错误基本没有区别。它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农民起义，没有人站在土地产权的经济学常识上去思考，更没有人怀疑通过暴力的手段进行土地变更是否恰当，这种暴力会给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所有的人都站在某个狭窄的角度里孤芳自赏，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堆廉价的颂歌。柯鲁克夫妇的这两本书应该可以归到这样的颂歌里。今天我们看这样的书，首先是反思，其次是在比较翔实的史料里进行反思。这样说来，这两本书的史料价值还是比较明显的。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另一本类似的书：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中文名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 a classic accou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北京出版社，1980 年）。在某种意义上，辛顿和柯鲁克夫妇异曲同工。都对暴力性的土地分配进行了赞美，忽略了土地产权危机。倒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上世纪初的长江下游自然市场进行了理性的调查，揭示了土地私有、副业、贸易和运输业对农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今天，苏南经济的态势，

事实上是对费孝通当年描述的经济态势的一种回归，是对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和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一种偿还。只是我们偿还得还不够，更加本质的农民权利至今还被某种威权攥在他们的手里。



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需要提出：在 3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民的贡献在哪里？答案其实是明显的，第一是农民通过责任田的形式解决了中国人的饥饿问题，第二则是农民以“民工”的身份介入城市经济，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业制造和城市服务职能。吉林省省长韩长赋为此写作了一本新书《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是最近几年国内直面农民工问题的专著。韩长赋属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团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过显著职位。他的书里明显规避了过去土地制度问题上的错误，也在农民的权利问题上进行了理性思考，让我们看到，高层可能并不是一味的画地为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民问题可能会走上自由权利的轨道，而得以最终跳出以暴易暴的历史窠臼。

不过，韩的著作并没有触及到土地私有化问题，更没有对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进行更直接的思考。事实上，这才是我的兴趣所在。整个 9 月，我都在继续读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书，并对今天中国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我想说的是，21 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 40 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首先出现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受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由此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

工政策的后果, 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 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 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米塞斯认为, 20 世纪早期盛行欧洲的极权主义, 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上风的产物, 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今天中国的大学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已经是一个显在的事实。我曾经在一个私人场合与清华大学的一名知名教授谈及农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面对我的疑问, 他的态度甚至是激烈的, 认为我提出的问题, 碰到了党的底线, 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教授的心态我当然能够理解, 他就像当年的韦伯夫妇天真无邪地赞美苏联一样。可是几年以后, 当韦伯夫妇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科学杂志》提倡“数学中的党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外科学中的纯洁性”, 他们还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么现在, 究竟有多少看上去有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能直接指出: 中国农民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公平问题, 而是一个权力问题。我对此抱以谨慎的悲观。农民需要在土地私有化、自由迁徙权和知情权等方面享受到国民待遇, 这几乎只是一个常识, 就像韦伯认为数学中肯定没有党性一样。我还相信, 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 中国农民问题只有沿着权利层面去建设, 才可能找到正确道路, 仅仅在结果的公平层面偶尔施舍、互相攻击, 也许又要绕到以暴制暴的历史旧路上去。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终于在 2007 年 9 月推出了他的遑遑巨著——《世俗化时代》(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7), 这本书也可看作是泰勒对其思想的一个晚年总结。他在书中以思想史的方式展现了现代社会从宗教氛围中展开世俗化的过程, 不过直到今天, 这个世俗化进程并没有能够完全宰制现代社会, 上帝也似乎并没有因此就死去, 相反宗教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泰勒从而试图以这样一本厚达 800 多页的著作来对现代社会的单一世俗化理论提出挑战, 现代化应该是多元的, 而且还应包含了民主的政治实践与超越意义的寻求, 这一结论其实今天看来, 与他过往的想法无大差别, 但是当一个垂垂老矣的人以这样一本著作来为其思想做出确认时, 我们或许应该对此认真对待。

接着泰勒的思路, 现代社会中对于宗教的了解非但不是多余, 反而是多重现代性中的必要内容。中国人对于西方宗教的各派, 尽管引介无数, 其实并不算熟悉。我们曾经对俄罗斯思想家的热衷, 其实也并没有激发起了解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兴趣, 但是我们阅读象别尔嘉耶夫的《文化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这样的著作时, 却仍然不断的看到东正教的巨大背景隐约其后, 而这只需要阅读该书的第一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就可以获得强烈的感受。在我个人的思想启蒙初期, 俄罗斯的思想曾经作为一种鼓舞性的力量产生出极大的力量, 后来却跟随所谓主流的思潮浪荡在英美分析哲学中, 并奉为圭臬。今天重读别尔嘉耶夫, 非但不会为其表述的模糊暧昧而不满, 反而会觉得, 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真实的体验才是哲学(或宗教)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天主教传统的著作在国内也陆续被翻译出版, 如德尔图良的《护教篇》(Apologeticus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 7 月) 就是古罗马著名的基督教护教作品, 而石敏敏先生翻译的西塞罗的《论神性》(On the Nature of Gods,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 6 月) 也已出版, 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 固然可以借助这些译本了解古罗马拉丁文化的细节, 而我们这些槛外人或许需要了解的是, 古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化璀璨的时代, 哲学家们均无法与宗教脱离干系, 今天的我们又怎样的把握来把宗教经验驱之门外, 充耳不闻?

“上帝死了”, 是尼采说的,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哲学家, 说出了揭穿现代世俗思想这件“皇帝新衣”的第一句无忌的童言。但是如果把他仅仅理解成一个破坏者, 这无疑又太过偏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Der Fall

Wagner/Nietzsche Contra Wagner, 卫茂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这本书讲的似乎是一个音乐的事件, 但是对于尼采而言, 瓦格纳是他试图超越时代的一个迷思, 他曾经以为瓦格纳的音乐可以如宗教一般拯救心灵, 但是后来却真正认识到, 他的音乐其实是现代浪漫派传统的一个集大成者, 体现了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比如形式与本质相分离、喜好繁文缛节与华而不实的外在形式。

如此看来, 尼采哪里是一个现代性的开启者, 他简直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反对者。不过略微让我感到疑惑的是, 尼采在这本书中回忆古典音乐传统时, 提到了莫扎特, 却不提巴赫。要知道门德尔松在 1829 年指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重新激发出对巴赫音乐的关注, 而尼采生活在 19 世纪中后期, 没有理由不知道巴赫的音乐, 翻阅了《简明牛津音乐史》(杰拉尔德·亚伯拉罕,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9 年), 才粗粗明白, 像巴赫这样一个教堂音乐的传统, 在 19 世纪已经由于新教革命与各个教派的分立而难以继, 《马太受难曲》这样的作品已经难以抵挡大型管弦乐与歌剧的冲击。而一位朋友更是给我找到一条直接的线索, 尼采其实评论过巴赫: “巴赫的音乐中包含着太多原始的基督教, 德国性和学究气, 在现代欧洲音乐发展的转折点上, 他总还是把头扭向中世纪。” 如此看来, 尼采对古典音乐的看法, 或许还需要做更多的细致考察。另外需要提及的是, 这本书还有一个山东画报出版社在 2002 年推出的版本, 而周国平也曾在《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中收录有《瓦格纳事件》, 我并未比较过数个译本的差别, 但是按照个人的阅读感受, 卫茂平的这个版本相当不错, 值得推荐。



回到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部分, 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 丘为君校订, 新星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也算是一本老书重出。前有山西人民出版社早在 1989 年推出的版本, 或许那时国内只是对书名显示出非常浓厚的兴趣, 对美国的学术研究状况缺乏了解, 作者本有一个中文名(舒衡哲), 却被直译成微拉·施瓦支。如今重译出版已经时隔 18 年, 当年被启蒙所鼓舞的知识分子, 如今已经秋叶凋零, 看来启蒙运动也未免不会流于“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尴尬困局。



另外让我期盼已久的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 8 月) 也终于在大陆出版, 另外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 8 月) 也同时上架, 关心晚清民国政治史的朋友, 或许不应错过这一套四卷的张朋园文集。

结尾照例要推介一本音乐类的书籍, 不过我很犹豫是否推荐下面这本彼得·鲁齐卡的《荒岛音乐: 德国的选择》(朱甫晓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9 月), 因为这本小册子是作者对三十位德国著名的文化人进行的问卷调查, 假设将他们送到一个荒岛上, 他们会带哪一盘音乐 CD? 假如读者熟悉当中提到的大部分唱片, 或许这是一本相当有趣的书, 因为你可以借此了解与比较他们的聆听感受, 但是如果不熟悉, 或许这本书只能算得上是鸡肋而已了。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今天先从一本老书谈起, 其实不算老, 是叶兆言先生的《陈旧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 4 月)。这种带有六朝气息的书名, 常常让人不知今夕何夕。按照作者的解释, “陈旧人物”有两解, 一为“陈旧/人物”, 一为“陈/旧人物”, “陈”作动词。如今新书太多, 走马观花也会目不暇接, 我是在看到他写高晓声与汪曾祺的文章之后, 才动了读这本书的念头。“旧人物”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以降二十七位文化界人士, 绝大多数名字如雷贯耳。其中最为名不见经传的是王伯祥, 此前我只知道他与顾颉刚、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茅盾)等并列为朴社发起人。





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是中学同学，“几乎可比桃园三结义”，也正是由于这重关系，作为孙辈的叶兆言与王伯祥有着亲密接触，借用后来流行的说法，是听过“带功报告”的，王伯祥在他笔下“复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一向对陌生的名字有特别的兴趣，就像乘火车经过一个个陌生的村庄，总会想象那些仿佛静止的空气里正在进行着的生死离别。王伯祥、陈迹冬、沈玉成，都是“陌生的名字”，他们分别出生于1890年、1913年、1932年，属于三代人，却有很多“家族相似”之处，身怀绝技（也可以说是“雕虫小技”）但名声不彰。王伯祥的《史记选》，陈迹冬的《韩愈诗选》、《苏轼诗选》、《苏轼词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都是家庭藏书中的常见书籍，他们隐没在这些书中，不声不响。偶尔出声就遭到疯狂的报复，王伯祥全家“差不多出了一打右派”（叶兆言之父叶至诚语），可谓“满门忠烈”。

叶兆言的《陈旧人物》与陈迹冬的《闲话三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属于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没有命名，但是作者群和特约编辑均与《万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被书友追认为“万象文丛”。这个没有命名的系列新近还推出沈昌文先生的《书商的旧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和《最后的晚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这位前三联书店总经理系银楼学徒出身，与另外一位出版界前辈、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类似，后者系五金店学徒出身。两位先生都不是“海龟”，从学徒到出版家，夜校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教育恐怕是现在的学徒无法享受的。王云五的回忆录《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只可惜是“节录本”。王云五与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都是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元老，值得后人好好学习，但两位有一处共同遭遇是他人无法效仿的，那就是他们先后于1926年、1927年遭遇绑票。这固然说明当时治安之乱，也说明出版界人士在绑匪眼中属于“新富人阶层”。放在今日，只怕主动邀请，绑匪也不会光临出版界人士。



王叔岷，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在专业领域是以研究国学而闻名的“大家”。据同学任继愈回忆（《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傅斯年曾用金条买下一部宋本《庄子》，专供学生王叔岷研究使用。当年绑匪只注意出版界动向，漏过了学术界，实在是重大战略失误。让人吃惊的是，后来王叔岷完成《庄子校释》，导师傅斯年要写序推荐，师恩浩荡，这位“忘恩负义”的学生却拒绝了。我有些怀疑这种故事是不是传说，但我愿意把它当作真实的事件。中华书局最近推出14卷本王叔岷著作集，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比较专业，他的回忆录《慕庐忆往》（中华书局，2007年9月）更适合我这种外行阅读。我所关注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当年的学术制度。在这本书里，王叔岷也提及自己两次拒绝傅斯年写序，傅先生不以为忤，还“仇将恩报”地把《庄子校释》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还是据任继愈回忆，丁声树没有写过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语言文字”的文章，成了史语所公认的出色的专家，解放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现在的大学行政人员常常辩称，人文研究没有统一标准，如果再不进行“量化”，就没法进行评价，从民国学术的先例来看，这种理由完全不成立。



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同时出版。在前一本书的序里，张朋园透露，他在任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写了5本专刊，其中4本纳入研究所的专刊丛书，只有这本例外，因为当时处于威权时代，所长王聿均将书稿搁置三年，然后表示自己“担当不起”，后来主持食货出版社的陶希圣先生接纳此书，该书成为1979年台湾十五大畅销书之一。我不敢苛责威权时代学者的“自我审查”，但“自我审查”到了比“外在审查”还要严格的程度，抢在图书审查部门之前把一本畅销书“枪毙”，这就不能全部归咎于威权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从一个常见的观点入手，即“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政治的败坏或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在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这个观点非常流行，并且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张朋园则认为革命的爆发与清廷先许以宪政来实施改革、后来又转趋保守有着重大关系。当公众连“望梅止渴”的权利都不再拥有，当然要“揭竿而起”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却总是一次又一次被遗忘。书后附有“各省咨议局议员名录”，绝大多数也是陌生的名字。在我



们的记忆里，他们似乎总是与“丑闻”相关，张朋园没有否认立宪派参与权力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是无法回避权力之争的），同时指出他们也有救时之心和救时之举，后者是长期以来我们不愿意正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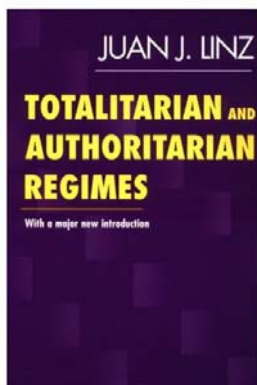
## 专题：政治转型

**编者按：**对政治转型的关注自然是出于对我们自己生存境况的考虑，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政治结构在转型过程中所会遇到的种种问题。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通过对东欧与俄罗斯转型经验的阅读，意在说明，我们对于政治转型的一些潜在逻辑或许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 威权政权的前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延续？

书评人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 [qiangwu.de@googlemail.com](mailto:qiangwu.de@googlemail.com)）

最近在读 Linz 的《极权和威权主义政权》。最早接触 Linz，还是大学时代读内地翻印的台湾幼狮版《政治科学大全》，也就是美国读书（Reading）出版社 1975 年推出的煌煌八卷本系列的第三卷——《总体政治论》。总体政治其实就是宏观政治，这一卷也是八卷中最厚者，足足八百多页。Linz 的“极权与威权政权”一文就在其中



占了两百多页，翻来覆去只为讲清楚这两个概念。记得当时把这部大砖头放在床沿，一续再续，续期到了就先换掉然后借请同学再借出来，这样在我的床头足足停了一个学期。无他，这卷总体政治论囊括了达尔、亨廷顿、泰勒，还有蒂利，都是名家。这套书的出版本来也是 1970 年代政治学的一大盛事，只是中国那时还在也许更伟大的政治荒唐的尾声，政治学学科跟社会学一样，早已被打到多年。好在台湾的幼狮，这家中国时报下属的出版社在 1982 年就推出了中文版。这个速度已经相当快了，大陆盗印的速度也不慢。我趁着 80 年代读书热的尾巴寻觅了许多家外文书店附设的内部书店，只搜到另外两卷：非政府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冥冥之中，这两本偶得居然暗示了 20 年后的研究方向和职业道路。

读书与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的交互穿透，很多时候说不清楚到底人生因为读书而继续，还是读书改变人生。十年前，曾经在暑假专程到北京复印他的新书《总统制的失败》，那是我其时做台湾宪改研究的参考。数年前刚到德国在大学书店买的第一本书便是 Linz 和 Stepan 1996 年的《民主转型和巩固的问题》，那会儿我还在读法学课程，并没有想清除后来做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当然不会想到这本书成为最近几年的博士论文写作中的案头常翻书。

最近 30 年政治学的发展太快，几乎所有政治学界的人已经厌烦了为什么都 30 年了还没有一套新的政治学手册。Linz 在手册的“极权和威权主义政权”一文也迟在 2000 年才首次出了单行本。除了增加了 Linz 的一个“深度回应”作序，原文未改一字，但是 Linz 在 30 年前写的东西却让我感觉再被穿透了一次。比如，在对极权主义的辨析中，Linz 强调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参与的精细化和极权社会政治积极分子的存在。后者，按 Linz，其社会效用与民主社会的志愿者颇像。难怪国内颇多学者在志愿者研究中主张“不问动机”，顺便把共产主义时代的遗产——街道、单位的党团积极分子们现在响应号召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统统视为志愿者，仿佛一夜间志愿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卓然而生，公民社会在党的光辉之下健康成长。在后共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如此精细化地为意识形态涂脂抹粉、献计献策，真是一个威权巩固的绝好例子。

Linz 说的极是，极权主义无需合法性，只有威权主义才需要合法性；在极权社会，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而在威权社会，合法性当然难以依赖已经式微的意识形态体系，而转型为更模糊也更实用主义的所谓精神。所以，当远离意识形态霸权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试图建构新的精神体系，就是在为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做精细扩展。市民社会理论已经被拿来，季羨林和蒋庆在尊孔复儒，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甚至神学理论也充斥着校园，他们都在共同建构曹锦清最近与凤凰周刊采访时提到的精神内涵。这样的威权主义下合法性的扩展，与其说是寻找威权主义的转型之路，不如说是帮助威权政权的巩固。

在《政权》一书里，我们也看到，只有“去极权”，而没有“去威权”。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制这三个维度仅仅是区分极权和威权、区分不同威权类型的描述性依据，并无助于我们更多地理解更为繁杂的威权主义政权形态，关于他们自身的发展以及形态生成与转化的过程。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制这些经典的自由主义三坐标描绘的极权与威权主义结构其本身就是静态的，难以包含更深的结构过程和动态要素，帮助我们了解威权向民主的过渡、一党制如何转变为多党制、有限的多元主义如何扩展等等。这也许是历史的局限。Linz 在 2000 年的反思中承认，当初他并没有估计到后来的非暴力转型和民主传播，也就是 1975 年开始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在《政权》中，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或者就像波兰尼更早批判过的市场乌托邦。

更令人困惑的，从 1975 的南欧特别是 1989 的东欧开始的民主转型，到今天，对于大多数转型国家尤其是前苏东国家来说，尽管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都在不同层次上践行了十几年，民主似乎仍然停留在理想类型的层次，转型结果却是“半民主”、“缺陷民主”等等——若以 Linz《政权》一书的标准度之，还是威权！威权是否真的可能转型？或者，真正考验政治学家们的问题也许不是民主到底能否从威权中生长，而是威权主义到底有多强的生命力？

以我们生活的这个威权政体和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政治周期为例。跟每一次五年一届的大会一样，都曾经让外界产生遐想，却又总是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跟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相比，这个威权政体的改革进程非常的缓慢，哪怕表面上，至少很多天真的学子相信，威权政体有时候可能比民主政体有着更强的改革能力。事实上正好相反，尽管威权政体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或者引进了民主制度，或者引进了市场经济，但是威权政体的保守倾向随着威权的延续都在增强，保守主义势力的积累远远超过、或者消化着任何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保守主义的平衡。结果，一个开放系统内，外部民主与内部进步力量虽然已经改变了威权的性质，却无法彻底终结威权的存在，这就是威权的晚期化。随着时间推移，在晚期威权之下，进步的东西可能被无限地保守化，退到前威权状态，比如王怡以圣经的名义对同性恋的批判。由着自由、正义、平等的门径，公民社会、政治儒学、新左派等等，都在与极端保守主义合流，装饰并且增加着威权的合法性。如果这就是转型、多元主义，看上去当然要比极权主义、比糟糕的威权主义好许多，却仍然只是威权主义。在这一点上，Linz 三十年前对威权体制复杂性的认识和对威权政体可能的内部民主的谨慎，在今天看来真是显得无比睿智。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 “赎买”的政治经济学

书评人 张昕（美国·洛杉矶 [xinzhang999@gmail.com](mailto:xinzhang999@gmail.com)）

这是一本不仅在研究俄罗斯转轨经验，而且在关于所谓“改革”的一般研究当中都相当特别的书：两位在上世纪 90 年代直接参与俄罗斯改革方案设计的美国学者提供了他们对俄罗斯转轨（1992—1998）的一个新叙事、一种新评价，更利用叶利钦时代改革派在政治策略上的得失成败详细论述了所谓“赎买”策略在推进改革中的独特作用。

在两位作者看来：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改革的最终方向，困难的是如何过渡到这光明的彼岸。给定改革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过渡的中心挑战就在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已有的利益，会对改革加以阻挠。和其他一些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相比，俄罗斯经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其结构“扭曲”程度也更高，意味着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阻挠改革进程的动力会更加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在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方案，保证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阻挠改革的进程。

作者的基本思路是：对于既得利益，要么不加补偿地直接剥夺（**expropriation**）；要么施以恩惠、给予赎买（**cooptation**）。改革派——尤其是在俄罗斯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在经济上资源有限、在政治上处于弱势，直接的剥夺未必可行。因此，赎买往往成为推动改革的基本策略：即不把既得利益者直接赶下台，而是在政治博弈中发给他们新牌；不完全剥夺他们现实中的决策否决权，但是通过改变利益结构使得他们成为改革的支持者，至少没有动力来反对改革。而在改革派手头经济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来赎买既得利益？对此，该书提出一个大胆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者往往需要通过创造新的但是社会损失比较小的“租金”来换取后者现有的社会损失更大的“租金”。

两位作者开宗明义地在第一章（第10页）即列出了剥夺与赎买策略并举、化敌为友推动改革的步骤。首先确定各项改革措施的得益者和受损者，评估各个集团现实中的政治实力；然后综合运用剥夺和赎买策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一部分给予赎买，并利用这些被赎买集团来实行对另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剥夺。最核心的策略是通过创造新的“租金”来换取旧体制既得利益者（改革的受损者）对改革的支持。

此后，作者结合自己参与俄罗斯改革方案设计的一手经验，描绘了这样的政治策略在俄罗斯三个不同政策领域的尝试。在私有化和宏观价格稳定领域，他们试图论证改革的最终顺利推进就在于成功地运用了上述策略；而在当时还没有顺利展开的税收改革领域，作者则认为改革派运用赎买政策不当，客观上把所有人都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这样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策略对于任何决策者来说应该都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然而，作者尝试提供的改革政治策略的“执行菜单”毕竟还是非常粗糙的一步。在他们“操作菜单”上的每一步都蕴涵着巨大的操作难度——否则在私有化和宏观稳定上找对路径的叶利钦团队也不会对税收改革上显得那么无能。

无论是确定某一项具体改革政策的再分配效应还是确定各个利益集团的现实政治实力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两位作者固然可以在事后清楚明白地把这些估量的结果在一张表格中都列出来（第15页），但是在当年现实的决策进程中，这些最基本的判断都不是那么自然明显的——这在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有很生动的记述。

而此后更富有挑战性的恐怕是赎买策略的具体实行。套用一下科斯的说法，赎买所依托的这个“政治市场”上对于权利（或者权力）的交易有着相对一般市场而言高得多的交易成本：赎买的“定价”的确定、赎买“合同”的执行都困难重重。比如，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过程中，一开始处于下风的叶利钦为了保证自己对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最终胜利，他与当时手头拥有巨额现金和媒体控制权的俄罗斯几大金融巨头达成协议，通过所谓“债权换股权”的方式将俄罗斯国有经济中的部分精华变相低价出让给后者，换取后者对自己在选举中的支持。这笔交易现在在很多人（包括本书的作者）看来，叶利钦的确有错估形势、“出价”过高之嫌。而普京2000年以后开始的反寡头攻势也是类似的政治交易缺乏可信度的一个鲜活例证：对于这样的交易里的“违约方”的约束不可能来自中立的法庭、警察之类的国家机器，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交易的一方。因此，如何保证赎买交易的双方能够达成政治市场上的一致，最终完成赎买交易就是此书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所提供的粗略选择中最具争议的应该是赎买策略的长期效应。为了推动变革而选择的短期策略可能给日后长期的制度建设埋下恶果：赎买所创造的新“租金”可能会产生比原来体制下旧“租金”更高的社会损失；而赎买的结果也往往会受到日后新的道义评判，形成制度不稳定的根源。

在俄罗斯，1996年的“贷款转股权”一直被俄罗斯公众视为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体”的奠基石，以致于至今寡头们的产权合法性还是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而俄罗斯产权体系在两轮大规模私有化之后所呈现的仍然是“形式多样”的“持续再分配”。在90年代初设计私有化方案的过程中，考虑到原先苏联国有企业的厂长和部分职工已经对国有资产拥有实际控制权，在政治上他们也拥有对私有化方案实际的否决权，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包括本书的第一作者）最终给了这些既得利益群体非常优惠的条件来获得这些理论上属于全民的资产。然而政治上的权宜选择也在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是一面倒倾向“内部人”的私有化方案给俄罗斯的产业部门留下了一个高度封闭的所有权结构，至今仍然是俄罗斯证券、信贷市场发展的严重制约。

本书另一个极具争议、又不乏普遍意义的是作者用以对俄罗斯改革进程加以评价的参照系。两位作者多次强调：评价改革的功过，不应该以任何“应然”的理想状态为标尺，而是要考虑现实中的政治约束。由此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给定俄罗斯90年代的“政治约束”，叶利钦政府内以盖达尔、丘拜斯、瓦西里耶夫、费奥多罗夫为代表的少壮派改革团队实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现实决策中什么构成真正的“约束”，似乎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早年关于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为什么没有采取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最流行的是“非不为也，不能也”的说法：苏联经济的官僚化程度远比中国的深，再加上高度的纵向分工，使得中国式的小范围试点再推广和增量改革的策略在当时的苏联面对巨大的政治阻力。但是俄罗斯学界反对该论调的也大有人在：戈氏在政治领域推行“新思维”时的阻力何其巨大，他还是能够坚持一路推进，何以在企业改革的时候就被“约束”住了呢？尤其是当政治决策本身制度化程度较低时，对于什么是“政治约束”的判断也是该书提供的策略框架中需要进一步展开的细节。

当然，两位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策略框架、尤其是赎买策略是留了后路的。他们在书中多次强调：这些政治策略的设计只能遵循一些粗线条的原则，执行过程中需要不断根据形势调整、甚至是“即兴而作”(improvisation)——也正因此，这本书才定了《没有蓝图》这样一个书名。

该书所描述的俄罗斯改革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身处中国的我们来说是再熟悉、甚至是再“亲切”不过了；而邓小平通过放权让利争取地方官员对自己在中央层面实施改革的支持、设立“中顾委”把老同志逐渐过渡出局等等也都可以视为赎买策略在经典的案例。略感遗憾的是，从全面分析中国改革的具体政治策略的研究除了美国学者谢淑丽 1993 年的专著（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和中国经济学家盛洪 1994 年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以外，这几年鲜有在理论建设上有份量的新作。其实，时机应该已经成熟。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00**

## 书评·政治与社会

### 英国让香港怀念？

书评人 严飞（香港，fei.yan@green.oxon.org）

1842 年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变成“日不落帝国”诸多殖民地中的一块。这之后英国 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又形塑出了今日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上的形态样貌。因此要透彻了解香港，就必须先理解英国的殖民管治。

欧洲大陆如法国等国家在开拓殖民地的运动中，一般希望能永久驻扎在当地，甚至把殖民地列入国家的海外省，因此在统治阶段中，往往较多地采取暴力和高压。而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压迫式的殖民管治并不可行，当地人民的反抗情绪，会伴随着高压政策而愈发激烈，进而演化成推翻殖民政府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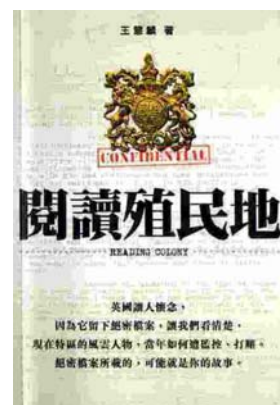
正是看到这一点，英国政府采用了一种“过客”的心态来管理海外领地：在政治领域，尽可能完整地移植英国本土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到殖民地之上，按照英国政府自身的模式和功能来设计和建立各殖民地政府，同时选择与殖民地内的政党合作，开放政府，以确保能够用最少的官员，达到最有效率的管治；在经济领域，则注重推行各种福利措施来降低殖民地人民发生暴动的可能性，维持殖民地的稳定，并扶持英资财团的势力，最大限度地掠夺殖民地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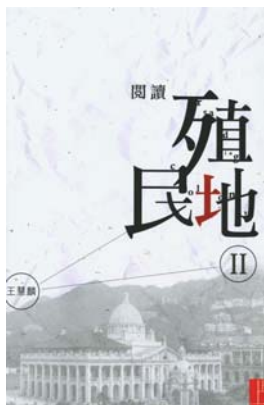
具化到香港这个地方，至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的管治虽已实施 100 多年，香港仍只能依赖少量转口贸易生存，产业结构单一化，没有像样的现代大工业。1950 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只有 31.5 亿港元，人均 1400 港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不到 250 美元，其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还比不上广州、上海，更难与欧美的大都市相提并论。有些西方学者说，香港直至 50 年代初，还是一个“穷酸破败的贫民城市”。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67 年才得到改变，在亲中人士领导之下，香港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反对殖民统治的社会暴动，这之后，港英政府终于开始采取各种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权利的善治。在总督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ze）的带领下，先后创立了廉政公署整治官员贪污，设劳工署调解劳资纠纷，制定解雇补偿等劳工保护法例，同时启动长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以及九年制免费基础教育，从而打下了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然而，本书的作者在从英国伦敦历史档案馆中大批前港英政府逐步解封的机密档案解读中却发现，摇身一变晋身成进取有为型的港英政府，上述种种大规模的福利扩张却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一种精明的计算，从而令香港人“错误地”觉得一切功劳尽归殖民者，却忘记了英国人的殖民权术。

例如，港英政府早期曾实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英国人几乎占据政府部门所有的高级职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香港华人，在政治上则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华人不许涉足高级酒店和私人会所，甚至禁止在山顶一带的洋人住宅区度宿。有些





法例甚至规定，华人无通行证晚间不准出门，不得举行或参加公共集会。港英政府在 1882 年还颁布一项法令，其中规定：“总督有权禁止任何非英国籍居民居住香港，……并有权决定该人应行离港之日期”。

然而到了后期，特别是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发现这样的法令无法有效地进行殖民管治，于是在港大创办人、前港督卢押爵士（Lord Lugard）的倡议下，英国开始在香港奉行“间接管治”（indirect rule）政策，即殖民地政府输出经济利益（例如土地）予以本地有名望的土豪劣绅，以要求他们与政府合作，协助管理香港。

进入港督麦理浩时代后，麦理浩又提出有限度的政制改革，开放部分政治权力给予港人，加强港人对殖民政权和本土化发展的认同。高级公务员本地化的进程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加快，政务官所谓首长级的官员中，1977 年共有 337 人，本港人占 35.2%，共 142 人，到了 1982 年已经增加至 611 人，本地人占 45%，增幅达到 81% 之多。

但是事实上，对于港英政府来说，政治权力的开放，将极度不利于对香港的统治，因为“英人认为，港府部分重要职位，基于英国国家安全需要，仍要由英人执掌。”间接管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避免暴动，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显然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培养本地华人高级政治精英。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作者特地翻查出了一份 1974 年由当时的香港布政司司长罗弼时（Sir Denys Roberts）送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机密信件。在信件中，罗弼时详尽讨论了香港官僚体系的国家安全问题。罗认为，伴随着香港政府官员本土化加深的趋势，华人将不可避免的逐步攀上政府高层官位，并大范围接触到政府的核心文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罗建议将现有的高级官员职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List A）包括总督、布政司、保安司、政治部主任等，必须由英人出任；第二部分包括律政司、公务员事务司、财政司、副警务处司等，虽然不一定必须要由英人出任，但都应该由英人出任才合适。如果有华人官员出任这些高级职位时，部分涉及到高级机密的文件，将会提高阅读权限，以避免华人接触。

对此，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回归后所面临的如新机场大混乱、禽流感肆虐等诸多管治上的困局，正是因为是在港英政府统治下，英国人并未把所有的管治精髓，传授给香港本土的华人阶层，令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候缺乏有效的回应。而这内里的文章，在殖民政府的官方论述中却隐去不提。可见说到底，英国人并未接纳香港人作为自己的子民，各个管治权谋的交叉使用，只是最大化统治效益的诸种手段罢了。

从这层意义出发，《阅读殖民地》，就是阅读殖民政府的殖民手段，进而阅读殖民主义的管治路径，以及它们的演变历程。

王慧麟：《阅读殖民地》，CUP 出版，2005 年 6 月；

王慧麟：《阅读殖民地 II》，上书局，2007 年 7 月。

## 书评·历史

### 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mailto:wxy1978@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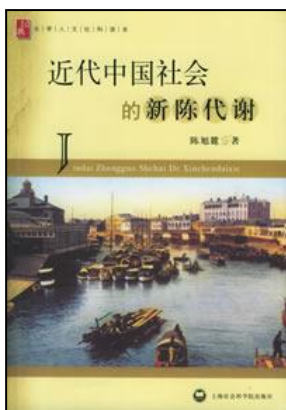
中学读文科，在应试教育的严刑拷打之下，闭上眼睛，几本历史教科书可以一页一页地翻过，绝对了如指掌。但另一方面，我又对其中的起承转合不甚了了，就像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指纹，却不明白它们的涵义。尤其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迷津。把一切都分成好和坏，固然有助于快刀斩乱麻，但是一切为二的乱麻依旧是乱麻，只不过从一堆变成了两堆，问题不减反增：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为何很多维新志士可以流亡彼处？孙中山是个好人，为何国民党却是一个反动政党？执政政府枪杀学生，为何鲁迅那么激烈的文章还能发表？蒋介石背叛革命，为何他奉孙中山为国父？除了这些迷津，还有很多幻象。比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五四运动被抓的学生被长期监押，或者处以极刑，后来才知道他们很快就被释放。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 年）改变了我的近代史观。我碰到这本书刚好是大二，已经不再是高考

的木偶，正是对既有的知识结构有所不满的阶段。茅海建“擒贼先擒王”，从“臭名昭著”的琦善讲起，提出疑问：被称为卖国贼的琦善果真卖国吗？这是一个让人急欲知道究竟的包袱，让我迅速进入这本厚达 600 页、多达 40 万字的专著。茅海建通过具体的史实一一反驳了时人和后人赋予琦善的罪名，但他没有陷入颠倒黑白的“翻案思维”。在历史学界，有一种简单的“翻案思维”，把过去的好人说成坏人，再把坏人说成好人。这种做法刺激了读者的习惯性思维，颇受青睐，但基本上还在好坏善恶的框架里打转，只是把黑白颠倒过来。茅海建反驳了琦善“有心卖国”的说法，更不认为他是“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而是指出琦善只是一名无知的官员——无力回天。《天朝的崩溃》不是琦善研究，茅海建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阐明“琦善卖国说”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有关。“奸臣模式”和“清官模式”，一反一正，从两翼维护着君主的权威。如果说琦善是“奸臣模式”的受害者，林则徐则是“清官模式”的得益者。在很多著作中，鸦片战争被理解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对立消长的两条路线斗争”。茅海建对抵抗的或妥协的主张都有批评，他认为“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路阅读《天朝的崩溃》，时时有触目惊心之感，暂且不说它如何动摇了我对鸦片战争的理解框架、如何钩沉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单单是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细节的重新解读就让人难忘。我们熟知老将陈化成、关天培的故事，茅海建指出这说明军官没有合理的退役制度。相对那种富有道德热情的歌颂，这种理性的分析更具说服力。



在《天朝的崩溃》扉页，茅海建将这本书献给自己的导师陈旭麓教授。很多读者对陈旭麓先生有所耳闻，可能不是因为他的历史学研究成就，而是通过余秋雨先生写于 1988 年的《家住龙华》（这篇文章因为收入《文化苦旅》而闻名）：“他是一个在 19 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 100 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



生活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貌不惊人，最初看到它的目录，还在使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半殖民地”等词语，以为是一本人云亦云的著作。仔细读下去，才知道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工作，非老先生的功力不可。《天朝的崩溃》有惊艳的效果，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翻阅一次；《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由于我开始漫不经心，后来才读出滋味，所以在第一遍阅读之后立即重读一遍。整本书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绵里藏针，目录不动声色，行文暗藏机锋，所以不太会让人“触目惊心”，却有“悠然心会”的感觉。论及太平天国，陈旭麓如此评述：“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论及义和团，他指出这种民族英雄主义“历史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外观”。陈旭麓认为“史识是治史的眼睛”，他的眼光不仅特别，而且具有一种长时段的纵深感。

他通过对比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指出中国在世界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他还认为太平天国“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庚子与辛丑之间的东南互保追本溯源起自太平天国的影响。这种“治史的眼睛”，在近视眼居多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这些本土学者，海外中国学研究对我这一代从 1990 年代开始自主阅读者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其中尤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代表。这套书至今仍在陆续出版，并且发展出“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等，作者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身居美国的海外中国学专家，有取了汉名的史华慈、魏斐德、宇文所安、裴宜理等，也有本来就是华人的萧公权、周策纵、余英时、许倬云等，还有一些欧洲和日本学者，比如谢和耐、岛田虔次等。甚至有些在海外本来算不上著名学者的学者，一旦著作被收入这套书，立即被中国学界视为著名学者。这套书涉及近代中国史的部分为数不少，不仅对一些史实有所纠正，还在方法论上有着根本性的转变。比如柯文（Paul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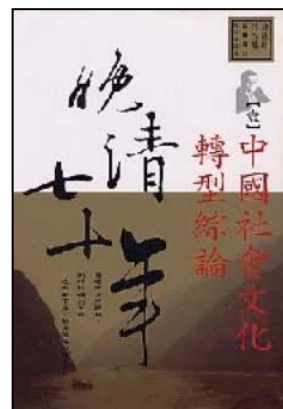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分别呈现了历史学家重塑的义和团事件、亲历历史者的义和团经历和一步步被重构的义和团神话，这种“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对习惯于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我来说，是一次奇妙的阅读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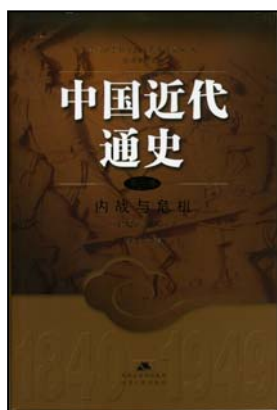
或许是版权等原因，“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没有收入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著

作。孔飞力比较低产，史景迁则非常高产，上海远东出版社专门推出了“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其中《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没有按照惯例从1840年讲起，而是追溯到1600年。中国学研究在美国，类似于非洲研究在中国，在学界都很边缘，对于公众而言更是遥远得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事情。史景迁的“故事大王”风格，使得他的著作不仅限于学术界，而是进入公众视野。这也使得他的部分著作预设读者对象是美国公众，而不是专业学者。《追寻现代中国》介于两者之间，主要探讨中国为何长期徘徊于现代国家之外。这种问题意识很容易被视作“西方中心观”，不妨把表述转换一下，它所探讨的是现代中国为何与其它现代国家具有如此显著的差异。或许是涉及范围过于开阔，史景迁处理具体史实时也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少地方沿袭既有的说法。《追寻现代中国》的中文版在台湾有3册，在大陆则瘦身为1册。这固然有版式因素，主要是删节的缘故，而且是没有省略号的删节。在删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像《废都》一样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字为宜。同样没有幸免于无痕删节的是唐德刚，这位“说书艺人”常常因此变得结结巴巴，《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即是一例。最为著名的当推《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它是唐德刚的英文讲义，更像“说”出来的，不像“写”出来的，读者仿佛只要用耳朵听即可，无需用眼睛看。让我感到不太满足的是，这本书是唐德刚计划中的中国近代史的“导论篇”，以论居多，关于具体历史的描述似乎只是留下伏笔，着墨不多。

“翻案思维”喜欢剥皮式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每次看到报端“给某某剥皮”的说法，就像看到凌迟的照片，我总是不寒而栗。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让自己的近代中国史观慢慢进行“新陈代谢”，上述著作正是起到这种作用。遗憾的是，研究著作、公众读物和教科书几乎分别相隔一个世纪。比如在历史学界，对义和团的批评渊源流长，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早已刊发于2002年的《东方文化》，没有引起太多反应，2006年刊登于《中国青年报》却变成了一桩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触及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对具体历史神话比如义和团的评价，一个是对教科书的评价。这次事件也说明，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不仅要在研究领域“活血化瘀”，还要在普及层面“以内养外”。



既然是新陈代谢，就需要知道前因后果，不是推倒重来。所以，撰文反驳袁伟时的张海鹏先生的观点，同样值得留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教科书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教科书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句话说得很好，学生在阅读教科书时，就需要对此有明确认识，知道自己所学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学者的学术研究是两码事。已经不是学生的读者要了解近代中国史，也需要对此有明确认识，知道历史教科书不等于历史研究，对于历史的了解不能依靠教科书。当然，张海鹏的有些观点让人不敢苟同，比如他认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等提法”是很新的观点，这就抹煞了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功劳，陷入他经常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



张海鹏的著作，我基本都没有读过，不敢妄加评论。他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我倒是读过两卷，一本是王奇生先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本是杨奎松先生的《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这两位先生的著作，我早有拜读，对他们有着特别的信任。与他们的其它著作相比，这两卷写得较为中规中矩。但如果耐心阅读下去，它们会更新我们对这十三年的一些认识，它们对这十三年的描述也相对比较清晰。王奇生梳理了国共从联姻到离婚的过程，还注意到不同话语隐藏的立场，他指出“北伐”是南方国民革命军一方的表述，从北洋军阀一方而言是“南征”。由此也

可以看出，他选择了旁观者的视角，不是站在历史的其中一方，像感情破裂的夫妻一味论证己方如何正确、指控对方如何错误。杨奎松梳理了国共从离婚到复婚的过程，虽然已经比较详尽，可惜限于篇幅还是有个别地方让人期待更多的细节，比如他指出1928—1930年间，“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国内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著作有多少是在租界出版，有多少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出版，因为这关系到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指数。

以上这些著作，都在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中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但它们能否直接影响国民，我不抱乐观态度。或许所有加在一起，都没有《走向共和》影响更大。没有必要因此否定研究著作的价值，《走向共和》也是充分借鉴了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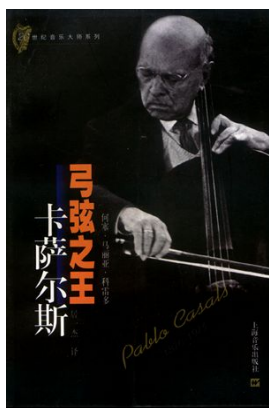


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产生。但是，我还是期待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生动同时又经得住专业考量的普及读物早日出现。国人需要对近代中国史有所了解，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或半个近代史专家，所以，我们不能指责公众不去阅读专业著作，更需要专业学者走近公众，当然不是于丹式的走近。

## 书评·艺术

### 卡萨尔斯：美是激情与道德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描述帕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是困难的，因为围绕在他身上的溢美之辞已经将他塑造成一个令人敬畏的音乐传奇，几乎所有知名的当代指挥家与演奏家都对他不吝赞美之意，只要一想到天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居然称呼卡萨尔斯为“弓弦之王”，一般人或许马上就会碍于盛名而噤口不语。仅仅从这些围绕在他身上的光环来了解卡萨尔斯，最终关于他的形象，或许无法脱离一些基本的符号，比如“天才”、“大师”等等。

显然这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要将卡萨尔斯的形象完整而又不失主见地勾勒出来，也许首先需要做的是先将那些赞美之辞暂时搁置，而着眼于其音乐与言语的自我呈现，这本《弓弦之王：卡萨尔斯》对于我们探究他的精神世界而言，或许正是一本合适的读物，略微让人疑惑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为《与卡萨尔斯对话》，翻译成如今这样的通俗标题，未免有点哗众取宠之意了。

对于大多数乐迷而言，卡萨尔斯所演绎的巴赫当然是一个不老的传说，他 13 岁时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音乐旧书店中偶然发现巴赫的六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乐谱，让他的生命从此之后与巴赫的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并不仅仅是演奏曲目意义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寄托与追随，对他而言，“巴赫是第一位的，其他人都排在后面。”，因为“巴赫是永恒的，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够达到巴赫的伟大、深刻和丰富。”

对于卡萨尔斯那一代演奏家而言，巴赫意味着严格按照曲谱，表达出那非常复杂的曲式结构，不带有任何情演，虽然在之前数十年，门德尔松才刚刚开始挖掘巴赫。当卡萨尔斯正式公演后，当时著名的德国大提琴家雨果·贝克尔公开指责卡萨尔斯是用亵渎的方式演奏这些曲子，因为卡萨尔斯不仅使用了断弓奏法，而且还居然让巴赫闪现出感情的色彩。听过卡萨尔斯演奏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人而言，自然都会对他充满内在激情的表现所吸引，这不仅体现在他演奏的速度要比斯塔克（Starker）、富里埃（Fournier）、罗斯特洛波维奇（Rostropovich）等名家快上不少，他还有一种让组曲复活的魔力，身上如同附有一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固有的激情本能，能让他的四周环绕着一种高昂奋进的氛围。他演绎的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就连同样以琴声浑厚闻名的塞尔金，也没办法在对话中显示出其力度，相反大提琴却总是演绎的激情如火，让人充盈着澎湃热情。

这样一个激情的卡萨尔斯形象，自然为乐迷所熟知，而他性格中还有强调道义的一面。他反对佛朗哥政府的独裁，因此流亡在法国，长期隐居在普拉德小镇上，也使得这个区区小镇一度成为音乐圣地，在巴赫逝世 200 周之际，这里涌入了一大批著名音乐家，正式开启了著名的普拉德音乐节的序幕。

他同样以在二战时期鲜明的反纳粹态度而为人所知，这让他获得了极高的道义名声。1945 年当他踏上英国的土地时，无数英国民众前来欢迎他，视他为反抗暴力的精神偶像，在二战结束后，他更宣布不再去一些对与纳粹有暧昧关系的国家演出，此举甚至让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写信表达钦佩之情。当然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贝多芬在波恩的故居。卡萨尔斯在 1955 年 9 月来到这里，逗留了数日，并且被允许使用了贝多芬的大提琴来举行了一个小型演奏会，曲目是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的第一组曲，他以此表达对贝多芬的敬意，或许对于那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伟大音乐家，他总是有心生戚戚之感。

在卡萨尔斯看来，道德、正义这些并不是和艺术无关的东西，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就是对我侮辱。维护正义是我的良心使然。”而音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尽管“人类的良知比音乐重要得多。你可以用音乐来提升人类的良知，但是最伟大的是爱，是对所有生命的爱。”卡萨尔斯所理解的艺术，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行为，而是与灵魂的事务有

关，那就意味着音乐不是让我们混淆与淡化是非，反而是要教会我们分辨什么是合乎人性的。

在这里，我们突然可以隐约感觉到，卡萨尔斯与康德在《论崇高感与优美感》中所表达的意涵有相似之处，虽然审美无法完全主导我们的道德实践，但是那却可能引导我们去判断什么是合乎道德和正义的，而这或许才是音乐赋予卡萨尔斯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美】何塞·马丽亚·科雷多：《弓弦之王：卡萨尔斯》，居一杰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 影像

### 金狮奖的题外话

书评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只花了三年时间，李安就加入了两届金狮奖得主俱乐部。这是电影节主席、白胡子的中国通马克·穆勒个人的胜利，也很可以使关心华语电影的人开怀。

李安仍然用惯有的低调，和一点冷幽默，来诠释自己的成功。如此迅速的走红，的确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低调和幽默证明，李安没有被走红冲昏了头脑。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想起了金狮奖的另外两位得主，张艺谋和贾樟柯，有一些题外话，也许可以说一说。

对很少几位中国导演来说，欧洲电影节越来越像糟糠之妻。从参赛者到大奖得主到评委，一圈下来，当年相看两不厌，到如今知根知底，偶尔还要拌拌嘴，花了十几年的磨合功夫。尽管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老欧洲仍然风韵犹存，但激情渐渐逝去，却是不争的事实。她属于往事，属于遗迹，属于马克·穆勒的白胡子，属于遥远1980年代；他却还在展望未来。中年危机中特有的貌合神离开始显露出来。这时候，奥斯卡以一场激情戏登场，挑逗有方，散发出新欢特有的气味。正是这种气味让开始显露出疲态的中国第五代神往并且兴奋。张艺谋、陈凯歌，甚至冯小刚，都鼓足余勇，在心猿意马地向奥斯卡进发。

谁在意威尼斯连续三年把大奖颁给华语电影？答案是，至少贾樟柯在意。2006年的金狮奖是他的电影生涯的转折点。日光底下无新事。柏林（《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戛纳（《活着》1994年）和威尼斯（《一个都不能少》1999年）同样也是张艺谋的里程碑。欧洲电影节是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们共同的成年礼。不同的，贾樟柯正享受与欧洲激情四射的蜜月，而张艺谋勉力维持一段平淡无奇的婚姻，心底里则渴望着能在美国有所突破。

欲望得不到满足，收获的就是失落，正如开了瓶的酒，放久了，味道难免要变酸。只看到华语电影在威尼斯的风光，很容易使人变得虚妄；而一味盯着奥斯卡的失意，会让人养成一颗善妒的心。最后，欧洲电影节和奥斯卡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了中国。2006年，贾樟柯和张伟平因为《三峡好人》和《黄金甲》的档期分配大吵了一架，这一架把他们的虚妄和嫉妒都吵了出来。

中年人的嫉妒是一味毒药，加上脾气霸道，这毒药的药力就来得更猛，张伟平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糟糕。但很少有人觉察到，其实虚妄一样是有害的。《三峡好人》在中国市场上遭遇的不公平被电影在威尼斯的成功夸大了。激烈地批评权力与商业可耻的结盟时，贾樟柯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想到他那些功成名就的同行花费了无数金钱去追求奥斯卡，他却诚实地表现着中国的生活，这骄傲并不能说是没来由。但在金狮奖之后，贾樟柯谈到中国电影的时候，口气就变成了救世主式的。这是一个为自己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的救世主。

很难了解到，是骄傲和愤怒赋予了贾樟柯诗意，使他获得了金狮奖，还是金狮奖让贾樟柯变得过于膨胀。青年贾樟柯和



中年张艺谋眼下的道路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电影仍然是在中国拍摄的。但在外人看来，他们拍摄的似乎是两个中国。不同之处是如此醒目，加上媒体乐于看到他们互相掐架，他们的相似已经被遗忘了。

作为身在中国大陆的导演，他们和所有有过抱负的同行一样，至少有一部，甚或是更多电影被禁止在国内上映。这些被禁止的电影都和欧洲电影节有着种种关联。但从《英雄》上映开始，几乎没有人提起张艺谋还拍过《活着》；而《世界》上映之后，贾樟柯此前 8 年拍摄的 4 部从未在中国公映的电影，也渐渐退出了议论。遗忘给带来的损失比想象的还要大。他们争吵的话题，终归不过是一些浮沫，真正坚硬的是被遗忘的禁片；它们才是张艺谋和贾樟柯共同和不可改变的中国经验。谁又关心这一点呢？

我想说，忘了欧洲吧，忘了奥斯卡吧，可是不要忘了被禁止的电影。但现实中遗忘的方向却与此相反。知识阶层乐于看到他们的对立。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现代中国文化的特别之处，就是由这样戏剧性的对立关系——骄傲的青年 VS. 财大气粗的既得利益者，批判精神 VS. 权力—商业联盟——构成的。但冷静地想一想就知道，任何人的愤怒都是难以持久的，骄傲也一样。

我很担心，眼前的贾樟柯与张艺谋，并不代表截然相反的两种艺术性格，而仅是人生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贾樟柯再往前走上几部，就会看到一个叫作张艺谋的路标。他会往哪个方向走下去？

有人认为这样的问题太悲观了。时间也许会证明，这样的猜度是错的。希望如此。如果不幸而言中，岂非是一场悲剧？

真没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吗？在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李安是另一种可能；不是因为他横跨欧美的成功，而是他仍然保持着自嘲的勇气和幽默感。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说过什么为国出征或者代言时代之类的鬼话，只是亲手剪辑了内地版的《色 | 戒》。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导演和一个成熟的中国人的姿态。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阅读报告独立发行，欢迎订阅，谢绝转载。